



民主

与近代中国

M INZHU YU JINDAI ZHONGGUO

李华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B2
57-C2

民主

与近代中国

M INZHU YU JINDAI ZHONGGUO

李华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近代中国/李华兴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1-869-3

I. 民... II. 李... III. 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B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033 号

民主与近代中国

作 者: 李华兴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75

插 页: 4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869-3/K·231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民主的追求和理性的反思——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民主思想研究	1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7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32
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53
论钟天纬——中国近代化和富强之路的探索者	65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	79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96
一部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饮冰室合集》	112
论严复的国家学说	116
维新志士的心态与变革的文化链	129
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	138
论孙中山的文化取向	154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剖析	165
论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的目标设定	177
民主科学的旗帜与中国革命的实践	190
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05



从传播欧洲思想到回归传统文化——《甲寅》时期章士钊思想研究	220
民国学制的演进与启迪	240
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化	259
抗日战争：历史的丰碑	273
官僚政治与官民关系	279
引以为戒——读《甲申三百年祭》	285
正气：中国的脊梁	287
1957 年：良机与逆转	293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	309
后记	328

民主的追求和理性的反思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民主思想研究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批判者和创造者。在西学东渐、民主东来的大潮中,具有时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思想前驱和文化载体的历史使命。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倦地追求民主:研究学者有之,奔走呼号者有之,赴汤蹈火者有之。然而,历史的回应似乎很吝啬,德先生在中国步履蹒跚,命运多蹇。

原因何在?人们不能不带着实践的困惑,求诸理性的思索。

从朦胧向往民主到文化深层的反省

尽管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包涵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精华部分,但它的基点却是维护“万世一系”的君主统治。明末清初,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①无疑是对君主专制的尖锐抨击。

“民主”这个词,中国早已有之。《尚书》曰:“天惟时求民主。”^②但是,《尚书》提到的“民主”,是指“为民之主”、“治民之主”,等于君主的代名词。显然,中国古代“民主”与西方近代民主,用词虽一,涵义相悖。中国人接触西方近代民主,并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理想来追求,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皇冠一旦被大炮打落在地,中国人从昏睡中睁开眼睛,对东西方政治制度稍加对比,封建君权很快便失去了它的灵光圈。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西方近代民主表



露了模糊的好感和朦胧的向往。魏源不仅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是战胜中国的长技,而且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公举总统,废除世袭,“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三占从二,舍独徇同”的民主政治,赞叹这种政治制度既“公”且“周”,“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③徐继畲则在1844年的手稿《瀛环考略》中,歌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继承三代遗风,“几于天下为公”,“可不谓人杰哉!”^④类似介绍,虽然普遍带有“礼失求诸野”的自大心理和“发思古之幽情”的复古情怀,但毕竟冲破了“夷夏之防”的牢笼,从对美国民主共和以及英国君主立宪的初步了解中,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从而迈出了向西方学习和追求民主的可贵的第一步。

近代在报刊上最早向中国人比较准确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天赋人权思想和三权分立制度的,是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1875年6月12日,《万国公报》登载了一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何为民主国?”文章介绍说,最关紧要的是:“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为什么要人人平等?因为不论君、臣或者小民,“均是人也”,所以“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文章还指出,各民主国的章程,最重要的“不过分行权柄而已”:“一曰行权(行政),二曰掌律(司法),三曰议法(立法)。”作为立法机构的“上、下两院,合言之即为公议堂(即国会)”。^⑤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传播史上,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

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和维新志士,向中国人民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三种国家制度,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他们认为“君民共主”,即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在论著中提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⑥

自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启蒙宣传和政治实践,主要着眼于变革国家政治制度;对比之下,严复的精力较多侧重于对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社会文化背景,作深层的理性思考。然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则是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将中国由中世纪引上近代化的富强之路。

作为观念形态,严复的民主启蒙思想更值得研究。

1895年,严复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武器,将韩愈的《原道》篇作靶子,对封建君权作了严厉批判。他认为,专制主义君权绝非“天之意”、“道之原”。

人们本来不需要什么国君来统治自己,只是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相欺相夺”的纠纷,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而人民自己又忙于“耕种工贾”,所以才“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维护民的利益。正由于此,“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君也好,臣也好,如果不能为民锄强防害,就应该废,应该诛。只有“民”,才是“天下之真主”。^⑦严复深刻地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⑧着意倡导尊民叛君。他还强调:“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⑨主张“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指责侵入自由者为“逆天理,贼人道”。^⑩

在“体用”观,即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或什么是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问题上,严复的见解尤为精辟。19世纪末,大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包括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西方社会的“体”。这个认识已经突破了器物层次的表面观察,深入到了制度层次,不仅是知识分子在忧患意识驱动下对改革前途的合理思考,而且符合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要求。但是,严复比同时代的维新志士甚至后来的革命党人看得更深,想得更远。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并非是西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应用。严复认为:“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予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⑪也就是说,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所以他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才具有“争驰并进”,“此既日异,彼亦月新”^⑫的竞争机制和创造活力。严复还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汽机兵械”和“天文历算”,并没有抓到命脉所在。他认为,西方的命脉有二:“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⑬而其核心则在自由二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如何发扬“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又怎能建设“屈私以为公”的民主国家?严复的这些思想,实质上已接近于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认识水准了。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把人们对民主的追求由理论化为行动。君主立宪的尝试失败了,六君子抱恨终天。戊戌变法的失败虽可举出多种原因,但严复对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素质所作的分析,最耐人寻味。百日维新前半年,他就已提出:“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



也。”^⑭戊戌政变后半年，严复又说，如果民智低下，“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⑮归根结蒂，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民智者，富强之原。”^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时，这种远水救不得近火的“不刊之论”，当然引不起多少人的理解、共鸣和支持。严复演了一场孤独的清唱剧，然而余音绕梁，90多年后仍让人叫绝。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强调，君主专制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封建暴政同“自由、平等、博爱”水火不容，君主专制同民主立宪背道而驰；主张“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使国家迅速走上独立、民主、统一、富强之路。

从变更国家政治制度的表层进行分析，辛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如果从观念更新的文化内层进行分析，那么，它只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毋庸讳言，模仿西方民主政治而建立的中华民国，有其名而无其实。对于新生的共和国，人们曾经满怀希望，然而也有人（如梁启超），在她尚未降生之时已经预言：“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⑰曾几何时，帝制复辟，军阀称雄，此话竟不幸而被言中。“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夕，人们的心情几乎从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深渊。民权主义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权利。陈独秀怒吼了：“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⑱民国时代共和政治的乌烟瘴气，尊孔复古思潮的愈演愈烈，不仅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痛感形式上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并不能把中国引上民主、独立、统一、富强之路，而且深刻地看到了文化背景、文化机制、提高民族素质，同社会政治改革存在着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于是，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创刊，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猛然而起。

纵览自鸦片战争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夕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强烈的忧患思维和紧迫的改革意识为基石，循着制度——文化——再制度——再文化的轨迹，从政治制度的模仿和变革入手，在挫折中不断反思，逐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求索民主的真谛和本质涵义的。这一阶段，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急于求成的愿望和浪漫主义的设想（革

命派居多),把模仿西方民主、变革政治制度,看作拯救祖国的灵丹妙药。但是,他们对变革政治制度的社会必要条件和艰难曲折,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准备。少数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严复等人,虽然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素质的分析中,看到了开发民智对于社会改革的极端重要性,但曲高和寡,难以付诸实践。随着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和中国近代工业的日渐壮大,愈来愈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青年学生,从民国政制形式和内容缺乏内在统一的体察中,痛切感到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准备不足,迫切需要从思想上补课,文化上反省,使“假共和”变为真共和。

五四时期一元多向的民主追求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时代,爱国主义和救亡意识是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内驱,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寻找中国政治制度的病根和社会改革的出路,是他们基本的思维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这种一元多向的历史现象,很值得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类,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号召国人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把“人权”解释为每个人都“各有自主之权”,各有“自由自主之人格”。强调只有在人权平等和人格自由的基础上,才能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权,求思想之解放;实行均产,求经济之解放;女子参政,求妇女之解放;造成近世欧洲那样辉煌的“解放历史”。^①他认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新社会,首先必须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②

陈独秀一开始便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③李大钊也说:“立宪政治基于自由之理。”^④针对民国政治的虚有其表,激进民主主义者尖锐指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而要树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拥有“自由自主之人格”,造成“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就必须启发人们“伦理的觉悟”,即个性的解放。陈独秀



强调,东西文化的一大分水岭便是,中国的伦理政治,以纲常名教和等级制度为根本;西方的道德政治,“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如果要在政治制度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就决不能在伦理观念上保守“纲常等级制”。中国人只有彻底打破“三纲主义”的奴隶道德,实现个性解放,争得人权平等和人格自由,使多数国民能觉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能建立真正共和立宪制的民主政治。因此,他认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归根结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认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③于是,民主与科学就成了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两面大旗。

“五四”以前,陈独秀追求的民主,着眼于争取多数国民的自由和幸福,在理论上倾向于卢梭的“国民公意说”——卢梭认为:“公意只考虑到公共的利益”,“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力量。”^④正是以上述基准为衡量尺度,比照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在1920年起了质的变化。他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全国的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的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⑤同年9月他还指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因而主张,劳动阶级只有经过阶级战争,使自己占领统治地位,才能享受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否则,“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陈独秀这时追求的民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了。

可见,从呼唤人权平等,提倡谋多数国民幸福的民主政治,转变为明确要求“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⑥从追求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要求建立俄国式的劳农专政,实现人民民主——这就是从《新青年》创刊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6年时间里,激进民主主义者追求民主所走过的历程。

第二类,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民主主义者。

在胡适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⑦他认为民治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二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

自己的主张”。^②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③（尼采语）在传播易卜生主义的论文中，他提倡自由发展个性，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鉴于“社会是个人组成的”，所以，“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胡适极力强调，在“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个人不仅要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对自己的所行所为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④胡适对民主和自由的解释，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倡导，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北大学生1919年1月发刊的《新潮》杂志，是传扬自由派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罗家伦说，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经过“人本的时代”，“科学的时代”，进入了“民治的时代”。他认为：“人人都应当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自然人都应当有思想的自由。”在考察了西方民主的逻辑发展后，他提出，中国应该走“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⑤之路。《新潮》的年轻作者们，主张“以公道主义为前提，以安宁幸福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依归”，从“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社会的”四个方面争取民主。^⑥对利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新潮》发表了与边沁类似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人必能利己而后能利人。欲实行利人之道，必以利己主义为其基础。”由此观之，“人道主义其鹄的，利己主义其经程也”。^⑦

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将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的充分发展，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进步的酵母，将利己主义看成通向人道主义的必经之路。这种基于个人自由权利而形成的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使他们后来或者成为人民民主的对立面；或者出洋留学，忙于把自己“铸造成器”；或者从事开发民智的科学教育事业；或者30年代参加“人权派”；或者一辈子欣赏和追求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有的则依附国民党，成为政界显要人物。

第三类，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一切权威，主张绝对民主、绝对自由。他们宣称：“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无论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好，君主专制的政府也好，劳农执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对之。”^⑧区声白断言：“专制政

府固恶,即共和政府亦未必善。”^⑧黄凌霜鼓吹:“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⑨在他们眼里,“什么德谟克拉西、布尔札维克,都不是绝对的自由”,唯有无政府主义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⑩

无政府主义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绝望的失常的心态和游民的破坏心理。它经不起理性的辩驳,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陈独秀当时就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样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⑪

第四类,以王光祈等人为代表的工读互助主义的乌托邦。

五四前后,蔡元培提出的“劳工神圣”,李石曾等人倡导的勤工俭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在中国一部分既想“改造社会”、又怕“流血革命”的青年学生中曾流行一时。

蔡元培在1918年11月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说后不久,又提出了“日日作工,日日求学”的新生活观,并在继续倡导国外勤工俭学的同时,热心推动国内的工学互助(即工读互助),企图以“半工半读”、“工学并进”为手段,通过“工学互助”的桥梁,到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世界”。^⑫1919年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王光祈提出:工读互助团的理想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团内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经费靠劳动所得,生活“由团体供给”。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如果各省逐渐推广,便是一场“平和的经济革命”。^⑬这类桃花源式的美妙设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上海、天津、广州、武昌、南京等地,虽然也都办起了类似北京的工读互助团,然而昙花一现,很快便销声匿迹。

第五类,以严复、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从向西方寻找真理,转为向传统文化回归。

19世纪末,严复、梁启超等人作为启蒙思想家或“言论界的骄子”,曾经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叱咤风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但在目睹民国政治的怪现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思想大变。严复早年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开民智,新民德”;1913年却赞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⑭次年又发表《〈民约〉平议》,系统批判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以国民公意说为基础的人民主权论,认为“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

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④3}政局愈动乱,严复就愈联想到自己海军生涯中,船长在狂风巨浪中指挥若定的权威的重要性,从而也就更加向往强人政治。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明知此公“非其选尔”,但几经权衡,仍列名筹安会。以前,他热烈歌颂西方,但1918年却说:“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④4}1921年10月,严复留给子女的遗嘱,第一条竟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④5}一个传播西方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家,绕了一个圈子,最后又回到了孔庙,向传统文化顶礼膜拜,多么发人深省!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以充满感情的生花妙笔,向中国人民大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然而大战结束,梁启超于1919年到欧洲转了一圈之后,便大叫“科学破产”。在梁启超看来,非但“科学万能的大梦”破灭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成了人民的灾祸,而且,“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于是,他竭力鼓吹以中国的“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物质文明,去“超拔”大洋彼岸好几万万喊救命的欧洲人。^{④6}梁启超一面大叫科学与民主破产,一面夸张其词地说:“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④7}

现实的“怪圈”和历史的借鉴

70年前,迫在眉睫的救亡运动召唤了五四启蒙,又因无可避免的理性失重(如民族主权取代人民主权,群体利益冲淡个体意识,独立盖过近代化,历史感情压倒价值取向),而窒息了启蒙;思想启蒙推动了救亡高潮,又因从属于民族生存的神圣主题,而被淹没于救亡。今天,我们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碰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开的“节扣”,难以回避的“怪圈”;而这些“节扣”和“怪圈”,大多在五四时期似曾相见。因此,理性的反思也许能为人们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第一,在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漫长过程中,一元多向是正常的历史现象。

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超越意识,经过改革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共同心愿,是“一元”的根据;各类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地位、利益需要、经历、教养、气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中国国情在认识和态度上的不一,是“多向”的成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势必一元多向。

既然民主追求的一元多向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应有倡导思想自由的气度,兼容并包的雅量。谁也无法禁止人们思想,“舆论一律”可以造成虚假的历史表象,但决非生活的真实。7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合理中隐藏着不合理,什么是不合理中蕴涵着合理;什么思想一时被看作“洪水猛兽”而日后取得了胜利,什么思想一时占统治地位而日后趋向衰败。这一切,实践会作出判断,历史会作出结论,人民会作出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实践中作出的选择。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蔡元培。70多年前,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极力反对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主张对各派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他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④对此,陈独秀十分感慨,他说:“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对待各种不同的学派,而且也应该适用于知识分子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除了“一元多向”,还要看到“终极归一”。归根结蒂,对民主有着不同理解和追求的知识分子,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使中国不但不会被“开除球籍”,而且能对于人类、对于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点,大概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也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第二,对于各派民主思想,要作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切忌形而上学。

五四时期,尽管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但是他们都不能回避一个严酷的事实:中国经济落后,民智低下,民族素质差,国民性亟须改造。激进民主主义者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把全部精力

用在武装夺取政权上,很快取得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自由派民主主义者则主张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主义,很多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办教育、搞科学。前者速效,应该肯定,但有很多课要补上;遗憾的是,建国后我们没有把发展教育和民主建设搞好,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几经折腾,民族元气大伤。后者缓效,短期见不到明显效果,长期看却是培养国本所必需。

各个时代的思想学说之间,都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借鉴性。社会主义民主也可以而且应该从资本主义民主中吸取它的合理成分。以自由而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符合人类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要求,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强调,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甚至毛泽东在1944年也曾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⑥可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解放”,决不是什么异端邪说,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并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有的条件。卢梭的“国民公意说”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在“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上是相近的,而且是合理的。但是,如何保证能形成真实的多数和公意,而非虚假的“多数”和“公意”?如何能防止少数人耍弄“多数”,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损害多数?这个原则,是否应该在人民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使之更加合理、更有保障?!

我们赞成五四先驱者们批判传统文化的勇敢战斗精神,因为,传统文化绝对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却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传统文化生根于中国这块土壤,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构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形成民族的思维模式,陶冶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已经融为一体。所以,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同在,我们不可能丢掉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文化而去搞什么“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的现代化,只能从既有的传统文化出发,根据新的社会条件进行自我扬弃,并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配置,经过两种文化相斥相纳的“涵化”过程,逐渐导向新文化的诞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四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固守传统文化当然不行,“全盘反传统主义”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排斥西方文化当然不行,“全盘西化”更不是中国的出路。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⑦

上面只是举了几个例,但也足以说明:对于以往“五四”研究论著中的不少定见,对于过去轻率予以否定或简单加以肯定的某些结论,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重新进行论评。

第三,发达的商品经济,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提高的国民素质,是民主思想生存发展的土壤。

五四启蒙运动为什么像在神州大地上卷了一阵狂飙,很快便风势消退了呢?除了过去常说的那些原因之外,还应该看到:

(1) 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人格独立的社会群体。那时,知识分子远远还不是既能脱离政治统治集团,又能对它施加足够影响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势力。他们在政治和学术两难处境中选择,终于受爱国主义的召唤,投身救亡激流,而使思想启蒙运动降为附从,不能深入、持久、有力地坚持下去。

(2) 历史的主体是实践着的人。人的素质,制约着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换言之,国民性是影响五四时期社会变革的基因。有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政体的不民主、不完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安之若素,意识不到它的不民主、不完善。鲁迅早就尖锐地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⑤

(3) 关键在于,五四启蒙运动没有一个发达的商品经济作它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⑥仅仅靠批判的武器和少数知识精英,并不能“消灭”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倒是商品经济这颗重磅炸弹,对封建堡垒具有强大的爆破力!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关系表明,生产者在经济上虽然互有联系,但根本上是独立的,不但彼此承认对方是产品的直接所有者,而且双方在经济联系中,意志是自由的,权利是平等的,让与是有偿的,交换是等价的。这种商品关系的精神升华,就表现为对民主、自由、平等、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追求。

因此,相对于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而言,商品经济呼唤的是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主义思想;市场竞争呼唤的是追求价廉物美和发展科学技术。德先生和赛先生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以克先生(Commodity)——